

中国养父母：“象征”背后的生活世界

Chinese foster parents living world Behind the symbol

中国人養父母の生活世界：表象を超えて

杜 穎

キーワード：日本、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児、中国人養父母、生活世界

要 旨： 本研究のねらいは、中国人養父母の実態調査成果をもとに、友好の象徴として表象されてきた養父母の生活実態を浮き彫りにしつつ、その生活実態をめぐる日本の戦後処理問題、中日両国の社会変遷と国家支援システムとの関連性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ことである。中国社会のなかでも貧困層であった中国人養父母は、戦後の中国東北に遺棄された日本人の子どもを養育したことで、人々に尊敬され、中日友好の象徴としてマスメディアによって表象されてきた。しかし、その背後に潜んでいる中国人養父母の複雑な人生体験は必ずしも充分に取り上げられてこなかった。戦後 70 周年に際して、中国人養父母の生活世界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ことは、歴史の観点からも現在の観点からも、大きな意義を持っていると考える。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东北地区也从闭塞走向开放。上世纪 80 年代起，东北地区对日交往增多，一度出现活跃的态势。其中，以日本遗孤及残留妇人寻亲归国为中心的交流与往来，成为中日两国地方社会交往中的一道风景。40 多年过去了，中日两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他们为中心的交往都遇到那些问题？为了从一个侧面了解这种变动的实态、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影响，本文拟对收养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母这一群体的生活世界进行考察。

中国养父母是指那些在日本战败之际收养了日本人孩子的中国普通百姓，主要集中在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人数约 10000 人¹，是一个少数人群体。二战后、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养父母作为中日民间友好的象征受到社会的关注。而方正县的中国养父母公墓，长春市的中日友好楼，沈阳烈士纪念馆的感谢中国养父母纪念碑、日本鹿儿岛“感谢中国养父母纪念碑”的建立以及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任期间为养父母举行的“感谢养父母信授予仪式”活动等，则使中国养父母象征作用进一步具象化。近一时期，伴随着相关文学作品和影视题材的大量问世，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从道德文化建设层面挖掘中国养父母的精神内涵。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中国养父母作为象征背后的生活世界却鲜为人知。调查显示，随着日本遗孤的寻亲归国和定居日本，中国养父母的生活世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复杂的人生经历有些超出常人的想象，十分值得关注。

以下，笔者拟从中国养父母生活实态调查研究思路的形成、地方社会中国养父母的生活

实态、关于中国养父母生活现状的影响因素分析三个方面对中国养父母的生活世界进行探讨。

一、关于中国养父母生活实态调查研究思路的形成

中国养父母问题是日本遗孤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迄今为止的研究多将其作为日本遗孤问题研究的一个侧面展开，缺乏专题性研究。对此，笔者将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聚焦中国养父母的生活。在此过程中，笔者将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并将有关问题置于国家、民族、社会及中日关系的框架下把握，这对于了解中国社会的中国养父母真实状态十分必要。

社会学的“生活世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主要指一个主观的一相对的世界。生活世界“总是处于不停地相对运动之中，并且构成一切特殊的计划、目的，以及更高层次上的目的地平线和有目的的工作的地平线的基础。”²“生活世界”随个体自我主观视域的运动而发生变化。从深层结构看，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种要素构成。这三种不同的要素，通过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在小人物群体中探寻历史动因和社会变迁，探究其发生和变化机制，能够以小见大。

研究认为，人自身在日常生活任何时间点，都是在生活史的规定框架下，即在自己定义的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内寻求自我的。³因此，对中国归国者生活研究要以他们主观世界的记录和揭示为目的。通过对他们“动态的生活世界”的重构，接近他们真实的生活世界。

迄今为止对中国养父母的研究多聚焦定居中国的养父母的生活，实际上，同中国归国者一样，部分养父母伴随遗孤的跨国定居生活使其形成自己动态的生活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养父母生活世界的变化与日本遗孤归国后的境遇、日本政府支援体制等直接关联。因此，对养父母的生活世界的考察，也应从民族国家、两国社会和中日关系的视角展开。浅野慎一《异国父母—抚养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母群像》和曹宝明的《中国母亲》都是以长春市的中国养父母为对象进行的调查，但二者对养父母的生活状态及其诉求的考察侧重却有所不同。钟家新《日本遗孤的历史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养父母进行了研究，特别指出了2003年以后，日本遗孤及日本社会对中国养父母发生的“由感谢到拒绝”的变化，并指出了一些遗孤在争取自身权利过程中的思想变化经纬。对于日本社会对中国养父母态度的变化，也有学者从社会结构不同说来加以解读，指出中日两国在对待中国养父母时的不同态度是否缘于中日社会结构不同的解读。⁴青年学者南诚等则以境界文化理论为支撑，研究了中国归国者在中日之间的跨境生活，揭示了中国归国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些成果无疑对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研究将以2008年和2011年两次实地调查为基础，重点对哈尔滨市养父母的生活世界进行考察。调查对象包括日本遗孤、中国养父母及亲子。本文不可能对全部中国养父母的生活进行考察，但希望通过对地区社会中养父母的生活世界的考察，呈现中国养父母生活实态，对日本的战后问题处理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就战争、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等进行深入的思考。

二、地方社会中国养父母的生活实态

（一）关于哈尔滨市日本遗孤养父母的概况：由于日本政府实施的“国策移民”，上世纪 30、40 年代，日本移民大量进入中国东北，黑龙江省成为日本“开拓团”进入最多的地区。由于日本战败后的弃民做法，黑龙江也成为遗留日本孤儿最多的地区。调查显示，现省会城市哈尔滨市为日本遗孤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总人数约 869 人⁵。其中方正县约占了三分之二。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遗孤开始大批寻亲归国。养父母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道外区孤寡老人的统计调查中，居住在哈尔滨市的养父母群体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2008 年，笔者进行调查时，养父母们大多已经进入高龄，由于动迁等许多人搬迁到其他地区。具体来看，15 名养父母中，8 人住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其他，南岗区 4 人，开发区 1 人。其中 2 人是从道外区迁往此地；方正县 2 人，现均居住在方正镇。其中 1 人原住在方正县会发镇，后搬迁到此。这 15 名养父母分别是：方大娘、沙大娘、李大娘、罗大娘、张大娘、马大娘、栗大娘、谢大娘、鲁大爷、刘大娘、钟大娘、宋大娘、唐大娘、姜大娘、龙大爷⁶。其中，方大娘、李大娘、罗大娘、张大娘、钟大娘 6 位老人健在。只是张大娘因患脑血栓已经无法正常交流；马大娘、沙大娘、栗大娘、谢大娘、鲁大爷、宋大娘、唐大娘、姜大娘、龙大爷 9 位老人相继去世。养父母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工人、农民及手工业者。其中，工人出身者占一半以上。养父母多为高龄者，最年长的张大娘 94 岁。另外，2011 年笔者又对在日生活的 5 位养父母进行了调查。他们分别是琦玉县的孙大爷、王大爷，札幌市的许大娘、张大爷，东京都的魏大娘。调查时 2 位健在，1 位刚刚过世。最年长者许桂珍 99 岁。

这些养父母都是在 1945-1946 年间日本投降不久与遗孤确立收养关系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如，李大娘，曾被日本人抓去当苦力。在日本战败、两国关系还处于敌对状态的背景下，出于对幼小生命的同情，亦或是为了一个承诺，中国养父母向日本遗孤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了将他们抚育成人，创造有利于他们融入家庭和社会的生活环境，养父母们可谓煞费苦心。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一半以上家庭让遗孤接受了高等教育。对养父母们来说，决不能忘记的是收养的经历。从 15 位收养情况看，7 位是从哈尔滨市（战后在哈尔滨市有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和香坊区等 6 处难民收容所）、方正等地的难民收容所领养的，1 位是养父从山沟里捡回来的，5 位是从亲戚处领养的，1 位是从朋友处领养的，1 位是在牡丹江东京城收养后搬到哈尔滨的。从收养年龄看，最小的刚刚几个月，最大的只有 11、12 岁。且多因冻、饿、不卫生等患皮肤病、肠道疾病。许多养父母们家庭收养时对遗孤能否活下来多没有太大信心，且承受了较大的精神压力。但由于他们百般呵护、精心照料，尽力医治，一个个从骨瘦如柴、站立不稳到白白胖胖、日益强壮，奇迹般地获得了新生。因此，在遗孤回国以后，围绕着养父母的赡养问题等发生了一系列的情感纠葛也十分引人注目。

（二）关于哈尔滨道外区的日本遗孤养父母团体

有关哈尔滨市日本遗孤养父母的情况，知道的人并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这一群体。究其原因，除了受日本遗孤状告日本政府的诉讼活动影响外，哈尔滨市红十字会日本遗孤养父母联谊会的平台作用十分重要。

上世纪 80 年代，在黑龙江省省会城市哈尔滨，信息渠道还十分闭塞，随着寻亲活动的不断展开，日本遗孤及中国养父母家庭对于日本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如何寻找亲人等抱有较多疑问。在其中一些人赴日寻亲以后，出于了解寻亲信息的需要，道外区的一些中国养父母便时常聚在一起，相互交流消息。特别是其中一位遗孤的中国养父赴日访问以后，来此交流人员增多。1984 年，由于市政府对孤寡老人的登记造册工作，哈尔滨市红十字会开始关注这一群体。出于更好地为养父母服务的考虑，相关人员在哈尔滨道外区成立了日本遗孤养父母联络会。1991 年，哈尔滨市道外区养父母联络会正式更名为哈尔滨红十字会日本遗孤养父母联谊会（以下简称“联谊会”）。⁷常设办公地设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32 号院内。为响应日本遗孤的诉讼活动，2002 年以后，挂靠哈尔滨红十字会的养父母联谊会，依托黑龙江省社科院等研究力量，开展一系列活动。一是接受日本友好团体及个人的慰问活动、同相关人士座谈交流；二是参加一年一度的市内观光及义诊活动等；三是声援日本遗孤争取自身权益的诉讼活动。在联谊会的组织下开展活动，几乎成了近 20 年来哈尔滨市养父母们的生活常态。

从以往的交流形式看，主活采取集体联谊和走访家庭相结合的方式。如不忘养父母恩情、连续 20 年访问中国的日本国东京中国歌舞团，每次来哈都要与联谊会联合举办慰问演出，走访父母家庭。2009 年日本遗孤感谢中国养父母代表团来访之际，联谊会配合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之会，组织了日本遗孤及养父母大型交流活动。由于哈尔滨市养父母联谊会影响力提升，其他地区相应机构的撤消等，全国各地的日本遗孤及养父母家庭也慕名前来。依托“联谊会”，哈尔滨市日本遗孤养父母与在日遗孤的命运共同体概念形成，一体感，连带感加强。

表 1.中国养父母收养抚育日本遗孤概况

项目 姓名	遗孤长幼排序	收养时间	收 养 年 龄	地点方式	健康状况	学历
张大娘	长女	1945. 11	5 岁	牡丹江难民所	体弱多病	大学
罗大娘	长子	1945. 秋	2 岁	来乞讨日本女人孩子	腿脚冻伤	高中
栗大娘	长女	1945. 9	4 个月	道里区工厂街难民所	浑身疥疮发高烧	中专
沙大娘	长女	1945. 12	1 周岁	牡丹江东京城难民所	非常瘦弱	初中
李大娘	长女	1945. 11	5 岁	南岗区花园街难民所	虚弱、站不稳	小学
方大娘	长子	1945. 12	4 岁	石头道街难民所	发高烧、满身疥疮	中专
鲁大爷	次女	1945. 秋	2 岁	方正县难民所	拉肚子	小学
谢大娘	长子	1946. 2	3 岁	移民点	虚弱、站立不稳	高中
刘大娘	长子	1946. 4	4 岁	兆麟街难民所	拉肚子，9 岁才好	小学

马大娘	长女	1945. 11	4 岁	阿城东南亚沟	冻伤营养不良	高中
钟大娘	长子	1945. 8	8 岁	方正县炮台山	惊吓	小学
宋大娘	长女	1945. 11	3 岁	亲戚处领养	拉肚子虚弱	高中
姜大娘	长女	1945. 秋	3 岁	南岗区花园街难民所	满身疥疮	初中
唐大娘	长子	1945. 9	1 岁	牡丹江难民所	小儿麻痹	大学
龙大爷	长女	1945. 12	3 岁	吉林省德惠火车道旁	满身疥疮	小学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三）实地调查显示的中国养父母生活实态

1. 以居住在哈尔滨市道外区的养父母为中心的调查

本调查主要是笔者以对定居哈尔滨市的 15 名养父母的跟踪调查为基础展开的。

①**经济状况：**调查显示，15 位养父母经济来源主要有三：一是老人的劳保收入。其中，最高者 800 元人民币（原为 600 元，2008 年增至 800 元），最低者为“300 元”。300-500 之间的 4 人。总体来看，在城市居民收入中居于较低层面。其中，农民和个体劳动者并无此收入。如鲁大爷。二是同住的亲子女。按照中国法律及传统，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而家庭赡养是最为普遍的养老形式。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许多企业都经历了改革的阵痛，由于不少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养父母亲子女下岗、无经济来源等，不稳定的生活状态也殃及养父母及家庭生活。如罗大娘、李大娘、马大娘三人的亲子女下岗后长期处于待岗状态，家庭生活失去稳定的经济来源。三是遗孤定期或不定期地从日本给养父母邮寄回来的钱和物。这部分收入多在逢年过节，或回国探亲时才有，其额度少则 1000-3000 日元，多则 10-20 万元，如果将其算作经济收入的话，这项来源在养父母家庭总体经济收入中所占比例有限，且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是经过中日两国政府协商、由日本政府和民间募集的赡养费。这项费用从 1986 年开始支付，每月 60 元，连续 15 年，领取方式为一次性领取。这笔赡养费必须通过在日遗孤的申请，且需经两国政府的认定方可获得。由于日本遗孤没有给申请或手续繁杂等原因，并不是每个养父母都能领取到这项补助金，如钟大娘。

②**居住状况：**日本遗孤回国后，15 名养父母或独居或与其他亲戚共同生活。其中，独居 3 人。分别是宋大娘、姜大娘和谢大娘；到孙子、外孙子家生活 2 人。分别是沙大娘、方大娘；到女儿家生活的 2 人。分别是龙大爷和马大娘。也有在几个儿女家轮换的。如，钟大娘；其他，或到亲戚家、或去了养老院。如栗大娘。但大多仍住哈尔滨老城区道外区。尽管哈尔滨市政府提供了比较优惠的政策，但在由平房进楼房的过程中大多遇到经济问题。一是六成以上的养父母住房选在较高的无电梯 6 楼到 8 楼，外出活动极其不便。如沙大娘，由于遗孤养女及时邮来 20 万日元才如愿从 6 楼降到 4 层⁸。但方大娘则因没那么多钱，只好选了 8 楼。腿摔折后的大娘上下楼得靠人背上背下。二是居住面积较小。15 户家庭中，居住面

积在 40 平方米以下的占 80%。三是采光度、通透性较差，有 60% 以上的房间朝向不理想，甚至严重背光。四是部分房屋供暖设施、居住环境较差。养母马大娘一家住在一处水泥厂附近，周边环境极差，有风刮过时，街道、树木就会落上一层水泥粉尘，正常出行都要包裹头巾。比较来看，养父母在城市居民中属于中低水平，大多经历了由平房到楼房的变迁。尽管与以往闭塞拥挤的平房相比，居住条件普遍有了明显改善，但在住房面积、楼层、市内环境方面均存在许多问题。

③健康状况：养父母大都是农民及小商业者出身，长期室外劳作使许多人在年轻时候便留下了病根，健康状况普遍较差。气管炎、风湿病比较常见。遗孤回到日本后，特别是近 10 年来，许多老人是在病困中度过的。据几位大娘反映，由于东北的冬季寒冷，每年开春和入冬时节，没来暖气的日子都特别难熬。每年总有几个月要在医院度过，吃药、打针、住院是常事，家庭经济负担由此增加：其中少则花掉 3000-5000 元医药费，多则上万元。如罗大娘，方大娘。其中，发病率最高的首推脑梗塞。目前已有四位老人因患脑梗塞已离开了人世，现有一位老人因患脑梗塞卧床多年，一直靠儿媳护理。但能得到像养母张大娘这样照料的人并不多。客观地讲，遗孤养父母身体状况不佳，是多种原因导致的，除上述情况外，还有家庭经济状况差、饮食结构不尽合理、消化功能减退以及同住的亲子女没能提供很好的照料等原因。但精神生活的不如意才是问题产生的最主要原因。2008 年至今先后有 4 名养父母离开人世。她们是沙大娘、张大娘、方大娘、罗大娘。

④社会活动状况：如前所述，15 位养父母的社会活动总体不多。主要是参与联谊会组织的义诊、旅游和接待国内外来访。养父母们将参加联谊会举办的活动视为自己生活中的大事，只要是能动，便绝不错过。其中，身体硬朗的养父母出席活动较多，如李大娘。一些养父母还到学校讲述收养遗孤的经历，或接受电视台采访、参与《舞蹈系》等影视题材作品研讨。但是近年来由于健康原因，能出来参加活动的越来越少。据养父母联谊会的人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养父母们正一点点淡出这个舞台。另外，是部分养父母应日本政府、民间组织邀请赴日探望养子女的观光活动。这对养父母来说，是难得的体验和经历。15 位养父母中，有 11 位去过日本。但赴日探亲，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和整个 90 年代。调查显示，在 2000 年以后，仅有 3 人去过日本。

⑤与遗孤的关系状况：绝大多数养父母对遗孤视如己出。首先，15 名养父母人中有一半以上因收养时无自己孩子，按照中国的传统，赋予遗孤“老大”（长子或长女）的地位。即便养父母在收养遗孤后有了自己的孩子，在吃穿上也是优先养子女。在所调查的 15 户家庭中，除了谢大娘是独生子以外，有 9 户为多子家庭。养父母亲们在回忆小时候的事情时都谈到父母对身为遗孤的哥哥姐姐的偏爱。其次，都努力给予养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大多养父母都基于“不能让人家说对别人的孩子不好”的朴素想法，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养子女的上学问题。15 位遗孤中 8 人接受了初中以上教育，有 5 人接受了高中以上教育。其中，养母马大娘因家里没有能力同时能供养两个学生，做出让亲生儿子辍学、让养女上学的决定。总体看，与普通家庭相比，遗孤接受教育的比例总体偏高。第三是许多养父母尽管千般不舍却做出让遗孤回到日本、与日本亲人团聚的决定。出于“日本遗孤回到日本能够改善生活”、“可以找到自己的亲人”的考虑，帮助遗孤寻找线索，忍痛割爱地在他们回国文件

上签字。当然，这其中也出现过养父母因害怕失去遗孤隐藏日本遗孤身世的事情。如沙大娘，在养女走后的三个月内，百般牵挂，托人将电话打到日本，直至听到养女的声音，焦虑的心情总算得以平复。另外，在 15 位家庭中，有 11 个家庭的养父母赴日本探望过遗孤。一些养父母逢年过节还给日本遗孤寄月饼、大枣、瓜子等食品。如宋大娘、龙大爷。而他们自己则无奈地选择了独自忍受晚年的孤寂生活。

从遗孤的视角看，中国养父母对他们有再造之恩。在问及对养父母的感情时，回答最多的是“没有养父母就没有我的今天”，“养父母待我太好了”，“用现在的话说，我在家就像小皇帝一样。”从盛大娘、方大娘养子处听到他们的感慨时能感受到他们对养母的浓浓的深情。另外，对回国后是否联系的回答，多是“联系”、“过年过节打电话”、“联系、回去过”。走访时发现，在许多养父母家里有在那个年代一般家庭少有的日产物品：如装有赴日观光的照片的精美相册、日本产助听器、松下制式的电视机等，包装精美的糖果、日式衣服等。如方大娘、马大娘。在遗孤回国后 20 多年间，80%以上的遗孤回来看望过养父母，但是次数总体不多。在所调查家庭中，20 多年间，最多者与老人见面达 30 次（包括养父母公费和私费赴日探亲在内），但多数遗孤很少回来。在方大娘葬礼上听一位邻居讲：“老人经常出来晒太阳，老人很爽快，呆不住，可腿摔坏以后，总爱发脾气。老人最期盼的就是养子回来。养子回来那次，老人站在大八楼眺望，高兴得像个孩子，逢人便讲。”有的走后一次也没回来过。如钟大娘的养子。“弟弟走后，妈妈话也少了，天气好时外妈妈会坐在门前大树下，看着很落寞的养子。”钟大娘女儿如是说。也有的遗孤由于出差、办事等回过中国，却由于种种原因没能与养父母见上面。对比回国后两个 10 年、遗孤来中国看望养父母的次数，笔者发现（除一例特殊外），刚回国以后的 10 年和最近 10 年、特别最近 5 年，遗孤回中国的次数较多⁹。但也出现遗孤疏远、躲避甚至是中断与养父母联系的事例。如刘大娘与养子、李大娘与养女的情感纠葛。

⑥养父母的牵挂和诉求：对于回到日本生活的遗孤，养父母百般牵挂，特别是日本遗孤状告日本政府的诉讼活动开展后十分忧虑。如针对笔者养父母“最希望什么”的提问进行调查时，回答不一。但 15 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回答“最担心的事”时，多数养父母考虑的是遗孤在日本的生活，回答最多的是“养子女在日本的生活好不好、健康状况怎样”、“个人告政府不会对养女不利吧？！”等等。如沙大娘告诉我，“我每天都看电视，看有关日本的消息，日本地震啥的都担心……”而对“最高兴的事”的回答则几乎都是“孩子从日本回来看望自己”、“去日本时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光”。对一些养父母来说，最纠结的就是看不到养子女、无法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养母钟大娘曾伤心地说，“养子回去以后再没回来过，老头去世也没能见上他一面。每当看到老鲁家（鲁大爷）的养女来看望养父，我心里不是个滋味，是不是‘好人没好报啊！可收养他我不后悔。’”在“最大的愿望和要求”一项中，养父母们提出“日本政府尽早制定政策、妥善处理遗孤及养父母生活困境”等要求。

表 2 调查时中国养父母的自然情况（2008 年）

姓名	年龄	健在状况	职业	姓名	年龄	健在状况	职业
張大娘	94	健在（08, 13 年去世）	医生	马大娘	84	去世（07 年）	无职业
罗大娘	88	健在（08, 12 年去世）	会计	钟大娘	86	健在（现健在）	农民
栗大娘	94	去世（08 年）	无职业	宋大娘	80	去世（04 年）	无职业
沙大娘	88	健在（08, 13 年去世）	工人	姜大娘	89	去世（06 年）	会计
李大娘	89	健在（健在）	无职业	唐大娘	90	去世（02 年）	无职业
方大娘	83	健在（09 年去世）	无职业	龙大娘	84	去世（05 年）	工人
鲁大爷	93	去世（08 年）	农民	宋大娘	80	去世（04 年）	无职业
刘大娘	81	去世（06 年）	无职业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调查资料整理

注：健在者为现在年龄，去世者为去世时的年龄

2. 以定居日本的养父母为中心的调查

2011 年借助在日进行客座研究的机会，笔者对定居日本的 5 位养父母进行了调查。

①在日生活的 5 位养父母的生活实态：如表所示，这里笔者将主要围绕着 5 位养父母的伴随意愿、来日时间、经济来源、居住状况、健康状况、社会交往等问题进行探讨。

表 3 定居日本的养父母自然状况（2011）

姓名	年龄	健在状况	职业
孙大爷	94	健在（11, 14 去世）	商人
张大爷	88	去世（07 年）	农民
王大爷	90	去世（08 年）	农民
许大娘	99	去世（11 年）	无职业
魏大娘	84	去世（01 年）	无职业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赴日访谈调查资料整理

表 4 定居日本的 5 位中国养父母的生活状况

名字 项目	许大娘	张大爷	王大爷	孙大爷	魏大娘
伴随意愿者	养母	养父	养子	双方共同	养女
来日方式	归国伴随	企业援助	归国伴随	探亲滞留	归国伴随
经济来源	生活保护	生活保护	养子供养	生活保护	养子供养
居住状况	市营住宅（同居）	市营住宅（分居）	市营住宅（同居）	市营住宅（分居）	都营住宅（同居）

健康状况	肾病	脑瘤	肠梗阻	肾病	老年综合病
社交状况	无	无	无	无	无

从表 4 可以看出，在来日意愿调查中，养父母主动提出伴随遗孤来日的 1 人，回答“身体不好，没法子”的 2 人，回答“听孩子安排”的 2 人。3 个家庭的养父母伴随遗孤定居日本，2 个家庭是在没有亲戚依靠的情况下随后定居日本。其中，1 位养父在个人及友好团体的担保和资助下实现赴日定居的，1 位养父在受到政府邀请后滞留、在入管局被关了 8 个月后再留在日本¹⁰；定居后“接受生活保护”的 3 人。认为“日本气候很好，比东北暖和，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再好也不如自己的国家”的 1 人，认为“自己有福啊，别人来不了”的 1 人；2 个家庭的养父母别居生活，他们是孙大爷和张大爷。3 个家庭养父母共居生活，他们是许大娘、王大爷和魏大娘。5 位养父母赴日时多已进入高龄，健康情况普遍较差；在家庭饮食、服饰及人际交往仍沿用在中国时的习惯。如许大娘等，他们愿意找人聊天，可通常情况下他们没有聊天的对象。从饮食情况看，养父母们多以中华料理为主。在孙大爷的冰箱里看到还存着雪里蕻等中国食品。这是养子知道养父的嗜好，特意从中国物产店买回来备着的。

在社交一项调查中，5 位养父母的情况均显示“无”。如他们所言，平日主要活动就是在家帮着做做家务，逛逛超市和中国物产店。无人聊天，就在家呆着。这几乎是他们的生活常态。针对笔者是否与邻居交往的提问，回答“只是见面打个招呼的，没有更多交往”的 4 人。回答“见面不说话”的 1 人。因为只会打招呼之类的“寒暄话”，无法深入交流。没有日本人朋友，不能正常交流是这几位养父母最大的苦恼。

②在日养父母的诉求：据笔者了解，迄今为止，定居日本的 5 位养父母中只有 2 人回过中国。所以他们因思念家乡，大多有“落叶归根”的想法。5 位养父母中，有 4 位健在时表达过去世后将骨灰送回中国的愿望。因此，3 位养父母过世后如愿回到中国。如从山东随养女定居日本的许大娘去世后 3 天，被养女和外孙子骨灰运回中国，按照当地的习俗举办了葬礼后埋在山东老家。如此，活着时百般不愿与养女分离的许大娘，最终还是与养女隔海相望了。王大爷去世以后，养子遵照他生前的愿望也将他送回中国。魏大娘的养女不但在养母百年后将其送回中国，还为养母买了有名的丁昆园墓地。但同时有 2 位养父母因为在国内没有其他亲戚、遗孤又不能经常回中国扫墓，去世后葬在日本。他们是张大爷、孙大爷。

表 5 5 位在日生活的中国养父母的安葬地选择

国别 姓名	日本	中国
许大娘		○
王大爷		○
孙大爷	○	
张大爷		○
魏大娘		○

综上，高龄后来到日本中国养父母，虽然实现了有人赡养的目标，但却因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比遗孤和配偶还要浓重的望乡之情等倍受煎熬。

三、关于中国养父母生活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无论是居住在中国的养父母还是定居日本的养父母，在遗孤归国后度过了不同于常人的生活。他们或是在遗孤走后经历家庭重组、生活的不稳定、或是与遗孤间发生了这样那样的情感纠葛，但绝不忘记的是于艰难困苦中收养遗孤的经历。从视若己出的收养，到忍痛割爱将他们送回日本，从对遗孤回来看望自己的期盼到遗孤躲避自己甚至不与自己联系的失落，从“我不后悔”、到“可别忘了我们”的担忧，不难看出养父母主体性受到了巨大挑战。但追根溯源，这些与日本政府的战后问题处理、中日两国社会发展变迁，日本政府的支援体系等密切相关。

（一）日本的战后问题处理

包括中国养父母老后赡养问题等在内的日本遗孤问题与战后问题处理息息相关。研究认为，二战后日本政府对日本妇女儿童进行了三次遗弃。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日本大本营参谋部出台了《关于关东军方面停战情况的实施报告》，其中提出，对待“满洲移民”等侨民的政策不是撤退，而是采取了现地定居的方法，希冀有朝一日让他们发挥作用。日本政府不切实际的想法，使得其在东北地区的遣返工作延缓，并造成了大量日本妇女和儿童的滞留。此为第一次遗弃。1959年，日本根据《未归还措施法》引入战时死亡宣告制度，对在中国等地有可能死亡的未归还者宣告死亡，这一做法，意味着日本政府对遗留在日本的日本遗孤等战后支援的中止。此为第二次遗弃。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遗孤回到日本，但日本政府既没有在学习、就业和生活方面提供有效的支持，也没有考虑日本遗孤不同于普通日本人存在文化差异等状况。此为日本政府的第三次遗弃。日本政府对日本遗孤的三次遗弃，使他们在归国、及归国后的自立生活方面面临重重困难，以至于不能很好地融入日本社会，这些也对他们赡养中国养父母产生极为不利影响。并酿成了如今中国养父母和遗孤之间的这场伟大而凄凉的情感纠葛。¹¹

（二）日本遗孤对血缘关系和归国富裕生活的追求

出于寻找有血缘的亲人和对过上富裕的生活向往，一些日本遗孤瞒着养父母赴日寻亲，但他们却忽略了此举给含辛茹苦抚养他们长大成人的养父母带来的伤害。一方面养父母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寻找血亲行动，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和希望遗孤过上好生活的愿望，让养父母们在他们回国的文件上签了字。实际上，获悉遗孤即将离去的消息，养父母感到寒心有之，一病不起的有之。作为养子和养女的遗孤及其子女的离去，在中国社会遗留下一批残留老人。这其中不无因爱生恨的案例。1981年，首批参加访日寻亲的遗孤王殿昌找到日本亲人，决定回日本定居，在同养母商量时，因养母不同意他回国，引起争执，结果养母把他告上法庭。1982年5月25日，《读卖新闻》发表了题为《晚年的希望破灭了》的文章，讲述了中国养父母的孤苦和绝望。虽然本调查中并无这样的情况，但类似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养父母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1986年5月9日，时任厚生大臣的今井勇大臣和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就举行了会谈，确立了按照每位孤儿抚养1位养父母计算，每人

每月 60 元抚养费，支付期间为 15 年赡养费用，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国养父母抚养遗孤的辛劳。但在中国养父母看来，这部分养老金对于处在经济大发展时期的日本政府来说并不算什么。之所以要这笔养老金多少隐含着“想阻止遗孤回国也阻止不了的”无奈意味。也就是说，在中国养父母接受媒体采访、赢得友好人士及团体“受四千年伟大的中华文化影响的中国养父母具有博大的胸怀”的赞誉背后，是养父母牵挂，思虑和失去依靠的虚脱感。这是普通的养父母们作为象征背后的真实感受。

（三）中日两国社会变迁

在日本遗孤回国以后的 30 多年间，中日两国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地上兴起出国留学热。进入 90 年代，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走上发展的快车道，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对精神生活要求提高。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发展因泡沫经济减速、进入所谓“失去的十年”。加之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的困扰导致中日关系复杂化，中日两国民众的心理也发生微妙变化，甚至是心理失衡。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赴日定居的遗孤心理、反映到在日遗孤的融入生活以及对养父母赡养。从中国养父母对遗孤“不求你啥，不指望你啥，回来家人还可以帮你”的态度，和一些日本遗孤吐露心声的话语“中国是人情社会，回中国一趟，亲戚啥的哪个人不得买些礼物啊，花不起啊！”不难看出，社会变迁对他们带来的影响。加之遗孤作为血缘的日本人，与文化上的日本人之间所存在巨大差异，无法融入日本社会，中国式的要面子的心理等，加剧了他们在养父母问题上的逃避做法。

（四）日本遗孤争取晚年生活保障过程中的思想变化

始于 2002 年的长达 7 年的诉讼生活对日本遗孤产生了诸多影响。一方面，安倍通过政治途径对遗孤问题的解决，使安倍在政治上加了分，从而避免了遭到国际社会的批判。另一方面，日本遗孤因为自身生活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对新政策支援法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这意味着遗孤向日本社会发出“请承认我们是日本人吧！”的信号。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对归国后自身“生活的不幸”、“低收入的不幸”等进行再思考。一些遗孤在反思自己来日时的期盼、为实现梦想的奋斗以及晚年生活保障无望的现状中，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不满。进而用实用主义观点来解释历史问题。而日本遗孤的“国赔”诉讼活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煽动自己的不幸，诱导自身不幸的认识的过程。¹²在这一背景下，有遗孤得出了“被贫穷的中国养父母收养，所以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无法融入日本社会”的三段论。有人甚至为成为这样的中国养父母的孩子而感到羞愧。这一状况其实与日本民间志愿者入乡随俗的指导不无关联。上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社会，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根深蒂固，更不允许“既是中国人又是日本人”的二元结构存在。因此，包括日本遗孤在内的中国归国者主动加入日本国籍，推进自身的日本人化，抹消自己与中国有关的痕迹等等。部分遗孤回中国探望养父母的次数减少，甚至中断与中国养父母及家庭的联系，不是孤立的事件。

（五）中日两国的文化摩擦

近年来，日本地方社会积极倡导多元文化共生，取得显著成就。据笔者了解，在北海道札幌市，中国“秧歌节”作为市政府推进多元文化共生事业的一环，获得市政府的正式批准。¹³但对外来文化接纳和包容度较低依然是日本文化的主要特征。中日文化虽然有许多共同性，但是其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日本遗孤及养父母普遍反映，“日本人情淡薄”、“亲戚之间的交

往也仅限于过年发个贺年卡、一起扫扫墓之类的。”有学者将此归结于中日两国社会结构不同：即中国农业社会的特征使亲戚间的联系比较紧密，而日本工业化社会，亲戚间的关系则十分淡薄。比如，叔侄关系，在日本被作为他人的关系，而在中国，尽管没有父子关系那么紧密，但绝不是他人的关系。另外，因语言的障碍影响交流，也致使相互间缺乏理解的基础。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形成的单一民族国家意识，加重了日本社会对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意识，从而加剧对中国文化等的排斥。在最近一次遗孤座谈会上，赴日生活一年回国探亲的遗孤配偶谈了自己的感想和体会，其中特别提到中日文化差异问题。其中提到一位中国归国者在家吃韭菜时，因为切韭菜产生较大的味道遭到邻居报警投诉的事例。类似事件反映出中日文化不同带来的冲突，这些也势必直接或间接地对在日生活的中国养父母带来影响。

（六）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养父母的支援

如前所述，日本遗孤寻亲归国后的80年代，中日两国政府经协商，由日本援护基金向中国养父母支付了月額60元、连续15年的赡养费。但此费用只在最初的几年中发挥了作用，到2002年的便全部中止。2007年新政策支援法颁布实施，但其中并无有关养父母的支援政策。在遗孤回国的20多年中，特别是近10年来，养父母及其家庭发生了诸多变故。日本政府将养父母视为外国人，长期置于日本国家支援体制之外做法，反映了日本政府对战后处理的无作为态度。而将养父母的生活问题全部推给了中国地方政府，加重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如哈尔滨市民政局部门为缓解养父母的生活困境，对高龄养父母实行的补贴政策。在此过程中，来自日本民间组织的支援活动给予了养父母以精神安慰。例如，“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日本国东京中国歌舞团”、“扶桑同心会”、“中国养父母谢恩会”等组织曾多次来华看望中国养父母。但在包括养父母问题在内的遗孤问题解决上，仅靠民间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需要日本政府层面加强认识，在法律框架下出台相应的政策，予以支援。事实上，作为半官方、半民间机构的财团法人·日本援护基金在促进养父母与遗孤交流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但是由于援护基金为中国养父母的资助来源一半为募捐所得，数量有限，在日本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对养父母的支援受到诸多制约。

结 语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养父母多是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贫苦百姓，他们在遗孤回国以后，经历了家庭重组、跨国生活的语言障碍、对异文化的不适应性，其主体性也面临一系列挑战。而媒体有关“遗孤对中国养父母发生的由感谢到拒绝”的变化的报道，在中日两国社会加剧了中国养父母“可怜的人”的形象。由于日本遗孤“国赔”诉讼活动的展开，生活问题通过政治途径部分得到解决，日本遗孤和志愿者也开始了有关将养父母的生活改善问题纳入支援政策的探讨，并提交日本国会。但收养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母，同遗孤的配偶一样始终被置于国家体系支援之外。令人不解的是，日本政府内部甚至有“等他们去世了就完事”的无作为的声音。事实证明，存在于中日两国间的养父母问题不会随着中国养父母的离去而消失，相反，如任由其存在发展，必然会成为中日家庭、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包袱。每每接待日本友好团体时，听到友好人士“中国养父母为什么收养‘敌国’的孩子，为什么又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将他们抚养成人后送回日本”的提问时，都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

沉重感。日本战后处理的后遗症，使日本社会在战后 70 年的今天仍然没有对战争责任进行深刻反思，而日本近代历史教育的缺乏，造成整个日本社会对战争记忆的缺失。从道德层面看，收养日本遗孤中国养父母的确赢得了日本遗孤、遗孤在日亲属和爱好和平的日本友人的尊重，但透过中国养父母的生活世界所看到的，则多是养父母的生活困难和孤苦无助。这种施恩与报恩的不对等，不仅会对养父母及家人的心理带来影响，还会使中国养父母的象征性弱化，进而动摇作为中日民间友好象征的基石。基于此，希望本研究能唤起更多的人对中国养父母问题的关注，进而推动养父母问题的彻底解决。

附记：本研究是笔者以 2008 年以来对中国养父母的跟踪调研和 2014 年 3 月参加在日本长野县饭田市举办的会议论文〈日本残留孤児と中国養父母との関係について——肉親関係を中心として〉基础上完成。

注解：

1. 根据国内方面有关遗孤的统计数字 5000 人推算得出的中国养父母数量。
2. [德] 胡塞尔，王炳文译，2001，《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59—160
3. 蘭信三，1994，《満州移民の歴史社会学》，行路社，18-19
4. 在“真实的东亚历史记忆共享与研究实践：以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对话为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孙歌研究员就与会发言进行总结性发言时提到的观点。
5. 关亚新、张志坤，2005，《日本遗孤问题调查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115-116
6. 在访谈调查中，笔者对用真名字可否征求了养父母的意见，得到了养父母的理解和认可。一些养父母还表达了希望把自己收养日本遗孤的事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所做的事、尊重自己的想法。但考虑到养父母和遗孤的个人隐私，这里笔者隐去了养父母的真实名字，使用采访时的称呼，即按照中国传统称为统一表述为 XX 大娘、XX 大爷。
- 7、11、13. 杜颖，2012《跨越战后：日本遗孤问题的历史与现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72—273；126—127；205
8. 2009 年日本遗孤感谢中国养父母大型代表团来访时，因大孙子出车祸，卖掉房子，沙大娘只好搬到住 6 楼的二孙子家。环境改变，加之楼层又高，不能经常下楼，大娘觉得住得很不习惯。2012 年 8 月，在哈尔滨红十字会养父母联谊会举办养父母博大情怀展时，再次见到大娘，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及精神状态明显不如从前。因为亲子住房安排事宜问题意见分歧，大娘第一次不像以往那样用赞赏的口吻讲述养女，而是略有微词。
9. 所谓遗孤归国前十年和后十年是指以遗孤的回国年实际年份和 2008 年为分割点各自向后和向前推算的两个 10 年。
10. 两次访谈都是在孙大爷家中进行的，孙大爷是山东人，受政府邀请访问后滞留日本，在入管局关了 8 个月，养子每周去看望养父，并不断向入管局解释、申诉，最后终于感动了入管局的工作人员，允许孙大爷留在日本。
12. 钟家新：《日本遗孤的历史社会学——以两次近代化为中心》，54-55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 [1] [德] 胡塞尔，王炳文译，2001，《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商务印书馆
- [2] 曹宝明，1999，《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养日本遗孤纪实》，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3] 关亚新，张志坤，2005，《日本遗孤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4] 杜颖，2012，《跨越战后：日本遗孤问题的历史与现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5] 潘德昌，2007，《日本遗孤问题探析》，日本研究, 04
- [6] 满史会编，1987，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内部印刷

日文文献

- [7] 蘭信三，1994，《満州移民の歴史社会学》，行路社
- [8] 井出孫六，2004，《『終わりなき旅—「中国残留孤児」の歴史と現在』》，岩波書店
- [9] 財団法人中国残留孤児援護基金，2009，《孤児に寄り添い 25 年—財団法人中国残留孤児援護基金 25 年史》
- [10] 山本有造，2007，《満州 記憶と歴史》，京都大学学術出版社
- [11] 坂部晶子，2008，《満州経験の歴史社会学》，世界思想史年
- [12] 蘭信三，2009，《中国残留日本人という経験—満州と日本を問い続けて》，勉誠出版社
- [13] 蘭信三，2006，《中国残留孤児の呼び—終わらない戦後》，《アジア遊学》，85 号，勉誠出版社
- [14] 桜井厚，2005，《『境界文化のライフストーリー』》，せりか書房

(DU YING／黒竜江省社会科学院)